

中国戏曲研究课的新收获 ——中文基地2000级笔谈京剧《曹操与杨修》综述

周晓痴

(湖北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799(2004)01-0111-03

2003年4月中旬至5月上旬,湖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国家基地2000级全体同学,在中国戏曲研究课任课教师的讲解和指导下,认真查阅了《三国志》、《三国演义》及其他有关资料;复印并阅读了陈亚先编剧、马科总导演的京剧《曹操与杨修》(1988年12月参加京剧新剧目汇演演出本,见《文学报》第408期);在课上、课下,反复观看了京剧《曹操与杨修》的完整光盘(1999年演出版);有的同学还观看了中央电视台戏曲频道正在此段时间播放的京剧《曹操与杨修》。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三次课堂讨论,还将精彩的几段分角色吟唱、吟诵即兴融入讨论中,课堂气氛热烈而活泼,不时爆发出会心的笑声和热烈的掌声。根据讨论课上最关注的和有争论的问题,任课教师拟出了22个小论文题目供同学选题时参考,每个同学都将心得体会写成一篇小论文,各陈所获,各抒己见,颇有可观,现综述如下。

一、引人入胜——建立在性格冲突之上的戏剧冲突

京剧《曹操与杨修》没有受制于正史与小说,而是抓住小说中最有“戏”的曹操“梦中杀人”和“鸡肋事件”加以敷写渲染,把曹操与杨修的性格冲突建立在一次比一次尖锐的戏剧冲突中;而曹、杨各自强压本性个体而趋同对方的努力,又总是因不了解对方而适得其反——不谙人情世故的旷世奇才与惜才忌才的一代枭雄在难以驾驭的个性冲撞中,迸发出惊天动地的闪电雷鸣,引起观众的强烈共鸣。对此,刘涛同学的论文说:“从事实层面看,曹操三次想杀杨修,三次隐忍,其性格固然有多疑猜忌的一面,但其求贤若渴之心也可见一斑——并不是一味地嫉贤妒能;杨修擅传军令,是因军情危急,并深知曹操此时已听不进任何忠言。杨修固然过于狂放自信,但其不顾一切挽狂澜于既倒,又显见报知遇之恩犹在——并不是真的恃才傲主。而从逻辑层面看,曹操却认为杨修一再而、再而三地喧宾夺主,实在不是做臣子的应有之态,自己忍痛舍妻,下嫁才女,如此惨痛的牺牲,也换不回他一点感动和让步;杨修则认为曹操听信谗言,滥杀无辜,全无初识之时爱才、用才及‘忧国忧民’的襟怀。双方事事偏执己见,终于在深怨对方‘不明白’的声嘶力竭的呼喊中,将戏剧冲突推向高潮。”在显示出各自的性格缺陷时,也在对照中同时丰满了各自的戏剧人物形象。

高超同学的论文认为:“一个是多疑如狐的权臣,没事就爱这里那里琢磨;一个是耿直快言之人,看到不合义理之事便要管要说,且不忘时时卖才。一个用才不避仇,用了又害怕;一个举仇不避嫌,举后又不去释嫌、防嫌,戏剧冲突就在难以相容的性格冲突中不断深化,引人入胜。”

潘潇潇同学的论文注意到戏曲与正史、小说的对比研究:“剧作者有意淡化了派系株连之类的历史环境,超越了小说对杨修之死的概括、平面叙述,层层深入地描写杨修过分看重自己的才干和能力,过高地估计了曹操对自己的依赖,也过高地估计了曹操的容忍度。”杨修“恃才傲物,咄咄逼人,在客观上置一意孤行的曹操于两难;而曹操用人不信,以错掩错,一错再错,于是孔闻屈辱死于前,倩娘冤死于后,杨修人头落地,最后只能是大错铸成,兵败斜谷,伟业化灰”。人物性格始终推动着戏剧冲突的演进,而戏剧冲突的演进又不断深化人物性格。

另外,罗义芳同学的论题,分析了“曹操的小人之心”。任金波同学的论题,认为“斩首,对杨修来说是一种解脱”。刘万超、余忠同学的文章,认为杨修应对其死自负一定的、甚至全部责任;而谢晨光同学则认为杨修之死是“挑战权威者的牺牲”。同学们还针对这两种不同的看法进行了辩论。这类不同的持论角度及对人物评价的巨大反差,正好说明了此剧所展示的个性生存状况的复杂性,其丰厚的信息蕴涵自然会引发接受者不尽相同的评价,激发浓厚的探求兴趣。当然,全剧高超的艺术性,善长用戏曲程式展现人物个性的艺术魅力,所有演员们通力合作、非常到位的表演,美声美歌动人视听,也是此剧引人入胜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二、动人心弦——对传统人伦道德的张扬与扼腕

通过此前《中国戏曲研究》课第一单元“中国戏曲的审美特征”的学习,同学们已经认识到,中国戏曲美学不强调再现功能而强调表现功能。既然强调表现功能,如何去抒情达意,如何去传递神韵,就显得至关重要。被称为“高台教化”的中国戏曲一贯重视人伦道德,而人伦道德正是在广泛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做抒情达意的文章,因而戏曲常常在特定的人伦道

[收稿日期] 2003-04-08

[作者简介] 周晓痴(1944—),女,四川成都人,湖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德、性灵情感的历史文化叙述中抒情达意,蕴涵神韵。对此,同学们对《曹操与杨修》主要作了两方面的论证。

首先表现在对杨修精神的总体肯定上。虽然不少同学认为,杨修胆量大而虑事不细密,行为端正而智谋不圆通;但其精神品格有三点应该充分肯定。刘锐同学的《明明白白的“不明白”》、高超同学的《为什么都不明白?》、韩凯同学的《两只刺猬的拥抱》、姜平同学的《招贤者、旁观者、智者》等文章对杨修的肯定性评价可以综合为这样三个方面:第一,杨修身处乱世,以天下为己任,为民求安,勇于从政,积极进取。只要能发挥自己的才干,甘心为曹操当一个小小的仓曹主簿,而且勇立军令状。第二,对挚友孔闻岱冤死满腔悲愤,以及一定要探明死因的义气与勇敢。杨修让倩娘深夜为曹操送衣的初衷原本是:“料丞相梦中杀妻心不忍,到那时水落石出见真情,但愿他引咎自责明心境,方显得汉丞相磊落坦诚。”对曹操的真诚期待、错误估计以及以曹操“畏友”自居的正气均令人浩叹不已。第三,曹操不听杨修再三劝阻,发兵西蜀,被困斜谷,眼看一场“赤壁惨败”又要重演,而此时的曹丞相却被阿谀奉承冲昏头脑,“全不见危机四伏火燃眉”,曹操与杨修矛盾已经到了触即发的地步。但杨修还是宁肯“逆鳞获谴罪”,终因紧急私调军队而获死罪。虽然他认为自己是“把独夫当英主我死也应该”,但当刽子手的大斧高悬头顶时,他还是拼死力撑住斧柄,冲曹操大喊:“丞相赶快撤兵,免得全军覆灭。”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毁灭了,而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著却震撼人心。杨修的行为不由人联想到,这是几千年仁人志士“力微任重神亦疲,再竭衰庸定不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精神的又一次再现。杨修超越和反抗生存界限的勇气与激情,使脍炙人口的“杨修之死”的故事,不再是可悲的或不幸的事件,而是跨入悲剧的审美形态,迸发出崇高的精神力量。

其次,表现在对倩娘与鹿鸣女的评价上:第一,写这方面文章的同学,特别是女同学,一致认为,倩娘与鹿鸣女生性善良,都是忧夫所忧,急夫所急;只因不幸卷入曹、杨冲突的漩涡就丧失生命,这太不公平。为此,杨安俊同学撰文说:“或许在她们心中,自刎具有非凡的意义,然而在今人眼里,未免过于悲戚,太不值得。”“她们是自己的傀儡。”这充分说明了封建社会的妇女失去“话语权”。“她们名义上是曹操的妻子或义女,实际上身不由己地充当着曹操政治斗争的工具”。第二,李炜同学的《震撼人心的灵台祭奠》、宋晓丽同学的《从曹操与杨修看京剧艺术》等文认为,作为艺术形象,倩娘与鹿鸣女都以其对丈夫的深情,对世情的洞悉,对幸福与事业的憧憬,不惜忍辱负重,在没有选择的选择时勇于自我牺牲,或以期维护丈夫的体面;或激励丈夫的人生价值追求。她们真实、感人的形象,远非《三国演义》中作为单纯道德符号的貂蝉一类可比。第三,少数同学还分析了二女之死的同中之异。周媛、彭小玲同学都撰文说:权丞相曹操掌握所有人,包括妻子的生杀大权,他“求”妻子赴死的深深跪拜,使倩娘顿感“相爷一拜如山重,拜得倩娘梦魂惊”。倩娘并非缺乏严肃刚正,在第二场戏中,她斥责谏臣公孙涵为曹操送酒已可见一斑。但她的死的确有被迫迫的因素在,而且,死后竟没有一个人敢说出、能说出真相来,死了也是胡里胡涂,实在令人凄凉扼腕。而鹿鸣女是被曹操作为安抚、监视的“赐物”下嫁杨修的,她处于丈夫与义父的夹缝中倍受煎熬。当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弥补夹缝的努力完全落空,就一如杨修般耿直、坚强,真情地对丈夫说:“我父相屈煞你也。”使面临大刑的杨修终于长叹:“大丈夫有妻如斯复何恨。”她也竟拔剑自刎,先死于夫,以壮行色,没有任何犹豫和勉强。她的牺牲在凄清之外,给人以更多的悲壮感。两位女性之死,不但使悲剧冲突由开端奔向高潮,而且成为悲剧主旋律中厚重而有力的和弦,大大增强了该剧以情动人的艺术魅力。不少同学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其他诸如《浅论〈曹操与杨修〉的悲剧美》、《试论京剧中的杨修之死》、《杨修与公孙涵对比论》、《生命中不能承受的一拜——回眸晋剧中两个女性之死》、《美丽的凋零》、《死,不应是唯一的选择》、《红颜痴情殉夫义,天地动容哪堪惜》一类笔端饱含感情的自拟论题,都在证明着该剧对传统道德的张扬与扼腕是怎样的动人心弦。

三、发人深省——沟通历史与现实的审美场

京剧《曹操与杨修》抓住了历史与现实的契合点,在导演、表演、音乐、舞台美术等多方面都进行了大胆的革新,超越了传统戏曲、小说里曹操的“大白脸”模式与杨修的“聪明反被聪明误”定格,也不纠缠于他们的历史功过;而是把他们作为“人类性格的审美对象”,让观众通过他们难解难分的纠葛,品味人性生存状态的尴尬,互难交流的痛苦,动机与效果总是悖反时心灵的挣扎与叹息,引发平日可能不觉于心的人文历史哲思,进入沟通历史与现实的审美场,从而获得最丰富的审美愉悦。

持以上观点的王燕同学在《谁是真凶?——也说杨修之死》一文中说:杨修恃才傲上,追求人格平等,“但他以为才能重于人际关系,无视曹操的感情”,“用倩娘送衣试探的动机是热情的,但却是对万万难接受的一厢情愿,方式是巧妙隐蔽的,谁知弄巧成拙,曹操居然杀妻圆谎,杨修纠错的努力落空了,曹、杨之间无法回避的人性较量与人生价值较量从此拉开序幕”。在“鸡肋事件”之后,曹操爱才心切,还有心赦杨,“岂知众将一词的担保反使曹操震惊:‘平日里一片颂扬对曹操,却原来众望所归是杨修’——曹操可以强忍杀妻之痛,可以容忍谋略高于自己的贤才,却不能容忍危及自己权威的傲上者”。“杨修能够超越盲从权威者错误的狭隘境界,却不能逾越封建社会的等级森严”。“说到底,置杨修于死地的不是曹操个人,而是曹操所代表的封建权势啊”。社会权力与人类智能的双向逆反这一文化现象,在《曹操与杨修》剧中得到了艺术的再现和深刻的揭示。

刘静同学在《在人情与性情的生死抉择中感悟毁灭与永生——曹剧的当代意识一瞥》中感叹:“似乎中国自古以来的主流处世哲学便是:人情居上,性情服从之。……然而在现代京剧《曹操与杨修》中,我们却清晰地感受到了一股张扬个性,

宽容人性弱点,追慕真实性情,消解英雄神性,还原丰满人格的当代意识。……曹剧艺术地赋予了‘特立独行’四个字一个合情合法的地位。当杨修高唱着‘到阴曹我再去放浪形骸’时,我相信他绝对是极为清醒地在迎合俗尚与坚守自由个性之间做出了一个沉重而高贵的生死抉择。‘放浪形骸’四字毁灭了杨修,也成就了杨修。”

张电冰同学在《对道德使命感的超越与曹剧的当代意识》中指出,倩娘死于“夫之所需,夫之所跪”,当“道德使命感”被当作谋私的工具,而奉行者又被“愚昧的崇高”迷惑,就将上演历史上“最虚伪、最残忍的一幕”。李协平同学的《曹操与杨修的现代品格》(提纲)则希望以后以较长的篇幅对此论题做更全面的研究。

另外,全班同学还对曹操、杨修形象的不同理解,悲剧心理与悲剧冲突,历史剧的评价原则,剧末用流行歌曲谢幕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或辩论。他们以各自的人生经验与审美悟性,坦诚表述了自己的思考与见解。

四、理论联系实践,学以致用快乐

同学们普遍反映,这次研讨京剧《曹操与杨修》的课堂讨论与论文写作,使他们体会到理论联系实践、学以致用快乐,这在不少同学的文章中也有表现。如夏玉娟同学《浅论招贤者在曹剧中的作用》的“内容提要”说:“招贤者在剧中出现12次之多,其作用不容忽视。本文从招贤者对剧情的推动,对主题的暗示及招贤呼声与杀贤结局形成的讽刺和反差,阐述招贤者在全剧中的重要作用。”她还在文章里说:“招贤者贯穿了全剧招贤、得贤、疑贤、嫉贤、杀贤、最终失贤的整个过程,体现招贤之难,用贤之难,渲染了全剧的悲剧气氛。”文章对招贤者在交代剧情背景、衔接故事情节、适时点评情节以及对观众做启发性提示四个方面的论证,更是学有所得的得意之笔。李珺同学的《浅论曹操与杨修中诗词的运用》一文,调动掌握的诗词知识,围绕中国戏曲抒情性审美特征运笔,具体分析了曹操与杨修共同背诵曹操20年前创作的《蒿里行》,如何使“二人的情感由最初的相识升华到相知阶段”;曹操《短歌行》慷慨悲凉的风格如何烘托戏剧人物曹操用人难、信人难的忧思;南宋词人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中“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搵英雄泪”化入曹操与倩娘诀别时的唱词“夫妻到此悲难忍,英雄泪染透了翠袖红巾”,写出了英雄曹操尚未泯灭的常人情感的一面,使这一复杂性格更真实可信;而第五场的布景提示为“茫茫白雪,群山素裹”,分明是化用了毛泽东《沁园春·雪》中的“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这种化用丰富了观众的想象,也为踏雪巡营时曹操替杨修牵马坠镫做了铺垫。

黎蓉同学的《白璧微瑕话曹剧》在充分肯定此剧是难得的艺术精品后,认为此剧“在艺术上则存在不少的疏漏,如有的情节不合生活逻辑和人物身份,结构不够严谨等,以致部分地损害了剧本的真实性和感染力,是白璧中的微瑕”。笔者一气列出曹剧七个“瑕点”,虽然有的忽视了编剧的创作倾向对构思的影响,过于苛求,但在第七点里,将《中国当代十大悲剧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版)中的京剧《曹操与杨修》与《文学报》第408期的版本对比,有理有据地论证它们的优长与不足,表现出善于寻找资料、善于思考的学习态度。特别是第三点认为:“杨修对各国商人冒险贩运来的粮马大煞其价,甘愿承担巧取豪夺的罪名,恐怕这是杨修这样一个耿介清高的名士所不取的。若出于构思的需要,可否强调曹操财政困窘,杨修才违心煞价,巧取豪夺?”不仅指明了自己认为的疏漏所在,还提出了自己的修改建议,文笔也简洁而严谨。

李猛同学的《不可忽视的尾声——看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认为:“曹剧的尾声有两大特色,一是剧尾曲是当代流行歌曲《让世界充满爱》,二是在歌声中两个主角曹操与杨修内涵丰富的握手。正所谓文章显志,《让世界充满爱》的思想应该是剧作内涵的有机部分,也是作者创作意图的一种体现”;“理解与信赖的缺失,是曹、杨彼此都不明白的症结所在,我想,作者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才特地让曹操与杨修在不是剧情的剧情里把手意味深长地、紧紧地握在了一起”;剧作家和导演“借一出悲剧,假古人之手,宕开一笔,完成一种对历史的反省,完成一种自我认识的提高。而且在这样特定的背景下,这种认识也就更能令人心为之颤,情为之动,就像曹剧,正因为历史遗留的遗憾和唏嘘实在太多,‘握手’给人的联想和震撼也就越为深沉了”。配合自己的文章,李猛还制作了软盘课件:即在《让世界充满爱》的歌声中,配上许多曹剧的有关剧照,并在讨论课上播放。

以上四篇文章,或密切结合剧作进行独到地阐述,或运用以往的知识积累分析问题,或从文本对照中坦诚自己的理论识见,或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用软盘课件辅助自己的观点,都表现出生动、活泼、主动的良好学风。从事实上看,此单元的课堂讨论与课后论文之所以比较成功,是因为全体同学始终置身在一种理论联系实际,能够学以致用的诱惑和快乐中,学习起来有压力,也有动力。这正应验了孔子的教育思想:“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

当然,2000级国家文科基地班的同学,从“觉得看京剧实在是浪费时间”,到饶有兴味地去评论京剧,与《曹操与杨修》深厚的思想内容与美仑美奂的艺术成就也密不可分。1988年,此剧就曾掀起大学生走近京剧、相见恨晚的热潮,15年后的今天,她仍然葆有强健的舞台生命,并成为文科大学生探求中国戏曲审美特征的优秀实践性文本。而打破传统戏曲美学原则与当代观众审美需求之间的隔阂,是《曹操与杨修》长时间拥有广大接受者的根本原因,为此,我们期待更多这样的剧本,更多这样的演出。

[责任编辑:熊显长]